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7-56

2007年8月13日

\*\*\*\*\*

## 爲什麼人服務是經濟學的大本大源 —— 讀《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角》札記

國家發改委研究所 夏小林

2007年3月，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猶他州大學經濟學教授E·K·亨特的著作《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它的英文版是2002年在西方推出的。該書展示了西方經濟思想史上一種有趣的現象：

在古典經濟學等一些流派的文獻中，雖然不乏偏見，但作者及作品對於重大論題的價值、道德和意識形態取向一般都是一目瞭然的。另外，即使如馬爾薩斯（1766~1834）這位對於窮人持有明目張膽的嚴酷觀點的作家，以及贊同他的人口論的李嘉圖（1772~1823），都不標榜個人及理論的中立性，也不惜筆墨描述資本主義制度下窮人的貧困狀況，承認、分析和維護現實。這一類公開自身價值取向的經濟學可視為西方經濟學中的“顯教”。

但是，在 19 世紀新古典經濟學的先行者中，其價值、道德和意識形態取向明明白白的極右翼經濟學人，如英國人納騷·西尼爾（1790~1864），面對激烈的勞資衝突和政府對工人的殘酷鎮壓，以及社會主義思想的蔓延，卻率先大聲地宣告了要建立非價值、非道德、非意識形態取向的“經濟學”，並將其確立為經濟學的重要方法和規範，在西方經濟學中影響廣泛。這種方法最重要的要求是，取消經濟學對惹起無窮爭論的福利（實際是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同時，在學術爭論中，他又毫不含糊、一點不“中性”地把社會主義的主張貶為“窮人政治經濟學”，並予以否定。另外，他還不“中性”地提出了極右翼的公共政策，如主張維持工人貧困、鎮壓工人運動、制定更為苛刻的《濟貧法》等等，以此來保障所謂的社會和“勞資和諧”。持同樣理論主張的法國人巴斯夏（1801~1850），還進一步用宗教權威來表明經濟學的普世性質，並把資本主義交換中的自私行為看成實現社會“和諧”的機制，先於當今而首創《和諧經濟論》。

這兩人在學術和政策主張上的缺陷，在非社會主義的西方經濟學範圍內，也受到了一些著名人物的批判、挖苦和抵制。如 20 世紀新古典經濟學傳統的奠基人馬歇爾（1842~1924），在方法上也小心地“遠離”這種虛偽的西尼爾~巴斯夏現象，在理論體系中保留著收入分配和福利的內容。他並實地考察工人狀況，在理論分析中吸取了某些道德和社會哲學原理，對於窮人狀況表達了倫理方面的關注。<sup>1</sup> 雖然他不同意馬克思（1818~1883）的社會主義觀點，但他仍然這樣寫道：

---

<sup>1</sup> 在當今新古典主義代表人物薩繆爾森教授若干版本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我們仍然看到了馬歇爾這種學術傳統的再現。

馬克思對苦難者的深切同情，永遠會博得我們的敬意。<sup>2</sup>

在 20 世紀中、後期，那些在新古典經濟學中重新提出極右翼理論和政策主張的人（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或稱新自由主義），再一次大聲地宣告了自己的經濟學的非價值、非道德、非意識形態取向。另外，他們在宣佈自己保持“中性”時，和西尼爾的自相矛盾狀況一樣，也毫不含糊地提出了非“中性”的極右翼政策，如主張在富國解構工會、混合經濟和福利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全面推行私有化、自由貿易，甚至和依靠軍事政變上臺，血腥鎮壓左翼和工人運動的智利軍政府等結成“神聖同盟”，並積極參與全面瓦解社會主義國家的活動等等。這種理論和政策主張的影響所及，使全球的貧富分化和各種社會矛盾，以及經濟增長與自然界的矛盾快速發展。當前，全球增長的極限不時閃亮紅燈，發展的遠景因資源、環境和貧困等問題日益嚴重而險象環生、模糊不清。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極端觀點的公信力、影響力大為下降。

這些橫跨百多年歷史而聯為一體，試圖掩蓋自身價值、道德和意識形態取向的經濟學流派，我們姑且戲稱為西方經濟學中的“密教”。“密教”實質上是無密可言，因為他們的理論和政策主張昭然於世，頑強地在通過種種渠道影響各國的政府和精英們，甚至和陰謀、暴力勢力聯姻。所以，這種“密教”很矯情。

在中國，重複西方關於經濟學非價值、非道德、非意識形態取向的聲音也不時凸顯出來。在這類聲音的背後，不時也能夠看到極右翼的政策主張，以及對於倫理、公有財產合法性、多數勞動者合法利益和社會 / 政治民主的漠視。其某些言論，與西方的經濟學右翼或極右翼的主張如出一轍。而這些都在標榜經濟學無價值、無道

---

<sup>2</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7 年 3 月，第 249 頁。

德和無意識形態取向的語境中進行著。

經濟學果真“無德”、“無性”嗎？溫故而知新。魯迅也說過，知史，看現在洞若觀火。以下，通過《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這本書，看看歷史是如何記錄和解釋這種偽善現象的，背後是否存在大本大源的問題，以及它對於今天的學術、政策交流有何啟迪。

這篇讀書札記分為四個部分：古典學派鮮明的價值取向；西尼爾虛偽的“中立論”；奧地利／芝加哥學派的偽善；右、左翼共識：經濟學的根本問題是為什麼人服務。

## 一、古典學派等：鮮明的價值和意識形態取向

重商主義（16世紀和18世紀）。<sup>3</sup> 在重商主義的發展時期，資本家多是商人。產業資本的地位低下。絕大多數重商主義作家是資本家或擁有特權的資本家雇員。這些人很自然地將資本家的動機普遍化。他們主張個人主義的經濟政策和貿易自由，拒絕關於國家和國家管理的統治觀點。他們把交換或買賣看作是利潤的來源。

重農主義（18世紀）。法國的重農主義主張用大規模資本主義農業取代普遍存在的小農場。他們不能成功，因為，封建的貴族階層認為這會導致土地所有者階級的貧困和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當時，法國需要1789年的大革命來完成這種轉變，並結束主要由封建主義與商業資本雜交所導致的社會和經濟混亂。

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處於社會經濟轉型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徵不明顯。但是，他們各具特色的資本主義訴求非常明白，

---

<sup>3</sup> 在《經濟學》第17版“經濟學的家譜”中，薩繆爾森等將重商主義學派劃定在17世紀，與E·K·亨特有不同的劃分標準。

其價值、道德和意識形態取向是公開的。<sup>4</sup>

古典經濟學（18世紀和19世紀）。一般將古典經濟學看作現代經濟學開始的標誌。古典學派和兩位代表人物的價值、道德和意識形態取向是一目瞭然的。

亞當·斯密（1723~1790）生活在工業革命伊始之際。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最高級、最進步的形式，代表人類文明的最高階段。他的《國富論》是在主張自由放任的目標下構築的。

他提出了關於勞動價值論的思想，認為利潤來自生產性勞動。在這種認識下，亞當·斯密的理論以一種比較實際的態度描述了資本主義中的分配和福利狀況，以及階級分化、對立和衝突，對資本家的道德有所批評。他承認財產權賦予某些人“不勞而獲的權利”；政府對財產權的保護主要是“為保護富者來抵抗貧者”；<sup>5</sup>勞資“兩方的利害關係絕不一致”，雙方之間存在不平等的鬥爭，資本家總是佔上風。<sup>6</sup>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看不見的手”是否能夠解決勞資矛盾問題，“斯密著作給讀者留下極端模糊或自相矛盾的印象”，即似乎能夠實現勞資和諧，似乎又不能。<sup>7</sup>

大衛·李嘉圖（1772~1823）。他坦率地確認，私有財產關係、資本主義的財富和權力分配關係是永恆不變的和自然的。

他發展了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他進一步分析了資本主義的分配關係，以及資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對立和衝突。例如，他承認“如果工資上漲，那麼，利潤必然會下降”。<sup>8</sup>

同時，他重複了亞當·斯密的見解，認為解決不同階級之間的

---

<sup>4</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2章。

<sup>5</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48頁。

<sup>6</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37~38頁。

<sup>7</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48頁。

<sup>8</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92頁。

利益衝突，以及母國和殖民地的衝突的補救辦法，是使交換和貿易更加自由化。例如，即使他描述了機器導致的更低工資和非自願性失業“對於勞動者階級往往是極為有害的”，但仍然堅持“工資正像所有其他契約一樣，應當由市場上公平而自由的競爭決定，而絕不應當用立法機關的干涉加以控制”。<sup>9</sup>

再如，他還看到在各階級之間的貿易關係中，存在“一方完全受損失，另一方完全得到利益”的現象，以及在母國和殖民地的貿易中，母國的強制限制，往往使貿易有利於母國而不利於殖民地的現象。但是，他似乎仍然相信“看不見的手”能夠調整這些矛盾，導致社會和諧。

其實，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以來，強勢階級、國家和弱勢階級、國家之間不平等現象的頑強存在，一直使“看不見的手”能夠導致社會和諧的理論面臨無解的衝突難題。

實際上，李嘉圖和斯密一樣，也在“是什麼”的層面描述了這些矛盾。所以，他的學說中也存在和斯密一樣的自相衝突：“看不見的手”能解決矛盾乎，不能乎？

面對這個問題，近 200 年之後的美國人薩繆爾森和諾得豪斯寫道：

美國人收入差距的擴大，許多人窮於無出路的工作和困於潦倒的左鄰右舍，不過是市場經濟加劇不公平的一種並非誇張的寫照。此外，北美、西歐、東亞一些富國，還有世界上其他一些國

---

<sup>9</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95 頁。這種觀點在後來的新自由主義中再次出現，對保守主義一樣有深刻的影響。今天，中國經濟學界也存在重複它的聲音。但是，我們知道，美、英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一直存在政府和立法機構對於勞動市場的干預。英國在撒切爾首相時代，也沒有完全取消這種調整機制。雖然，嚴重地削弱它導致英國血汗工廠現象普遍增加和兩極分化加劇，並成為保守黨被選民推翻的一個重要原因。

家的分配也極不公平。<sup>10</sup>

這算是新古典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看不見的手”的見解的一個跨越世紀的實證性回應吧。當然，比較古典派而言，儘管新古典派主張政府更多地干預經濟，並要求實行福利制度，還是因為在解決收入差距擴大上一籌莫展而不斷受到批評。<sup>11</sup>

另外，左翼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都指出，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與其資本主義和諧論之間也是存在矛盾的。<sup>12</sup>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馬爾薩斯和李嘉圖是私人密友。他的著作中肆無忌憚的價值取向、道德觀點和意識形態令人歎為觀止，故在此一提。他的理論和政策主張的一些要點是：第一，堅決維護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第二，批判社會主義。他認為社會永遠是“分成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並以利己心作為那龐大機器（即社會——引者註）的主要動力”。當時維護勞動者利益的社會主義者“是威脅人類走向完美進程的鉅大障礙”。<sup>13</sup> 第三，可憐的貧困大眾是每個社會不可避免的主要組成部分。富人是道德高尚的而窮人則道德淪喪。第四，他的政策主張，一是拒絕所有的財富和收入重新分配計劃，反對用立法（如《濟貧法》）形式去減輕窮人痛苦的各種努力。二是反對為工人增加工資。其經典的話語是，“僅靠勞動階級的消費能力無法促進資本的利用，認識到這一點確實是最重要

---

<sup>10</sup> 薩繆爾森等：《經濟學》（17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1月，第607頁。黑體字是引者所加。《經濟學》的作者同時指出，在收入差距擴大上，那些遠離市場的國家也不例外。但是，作者列舉的印度、非洲和安第斯國家真的遠離市場和美國策動的“結構改革”了嗎？另外，2006年美國官方機構宣佈，美國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469，創40年來的新高。

<sup>11</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385~390頁。約翰·米爾斯：《一種批判的經濟史》，商務印書館2005年11月，第5頁。

<sup>12</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261~262頁。

<sup>13</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59頁。

的。……工人階級消費的鉅大增長必然大幅增加生產成本，這一定會降低利潤，減少或者毀滅積累的動機。”<sup>14</sup> 第五，用宗教的權威性為其理論辯護。<sup>15</sup>

以上列舉的代表性學派或經濟學家，他們在其理論和政策主張中都毫不含糊地表達了自己傾心維護富人階級（商人、產業資本家或土地所有者）的價值取向、道德觀點和意識形態。面對層出不窮的社會矛盾和貧困問題，他們各抒己見，都涉及了收入分配、福利和倫理等問題。這是那幾代學者的一種統一的風格和品行。

其中，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還為勞動者階級提出自己的階級訴求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成為了各種社會主義理論的一種依據，最終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剩餘價值理論的發源地。這對於當時勞資矛盾日益尖銳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嚴重的革命性威脅。後來，否定勞動價值論的新古典經濟學大家馬歇爾，曾就此做出了如下的評論：

工人階級的福利情況，取決於他們收入的多寡。但是他們對於其他階級的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治安問題），要看他們所收入的部分是否等於他們所生產的部分，而不管他們的收入是多還是少。如果他們創造的財富很少，但全部歸於他們所有，他們也許就不會想到革命。假使他們覺得他們生產了鉅額財富，而所得的僅僅是一部分，那麼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就一定會變成革命者，全體工人也將都有革命的權利。許多人都指責現在的社會制度，說它“剝削勞動”。他們說，“工人常被奪去他們的勞動成果……並在法律的形式下實現的”。如果這種說法被證實，那麼，每一個正直的人都應當變成社會主義者，而他對改革產業制

---

<sup>14</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61、70頁。

<sup>15</sup> 馬爾薩斯要點的二、三、四部分，可以在今天中國的經濟學界聽到回聲。



度熱情的高低，就可以表現和衡量他的正義感的程度。<sup>16</sup>

相反，如果按照新古典經濟學中自由派的效用價值論規範，把經濟學分析集中為交換問題，而交換又是雙方自願地實現了各自效用的最大化，迴避其中交換條件的不對稱，迴避其中的隱含著的不公平等倫理問題，這就天下太平了！因為，在這種理論下，勞動者沒有理由變成社會主義者了，正義和倫理也會成為啞巴。

但是，歷史表明，從那時起直至今今天，如此進入了“象牙塔”的自由派經濟學，其實並沒有能夠平息勞動者階級為改善自身狀況而進行的各式各樣的鬥爭。經濟史、社會史和政治史總是與這類經濟學打架、打假。

而比較保守的經濟學家，如著名的馬歇爾和當今新古典經濟學的主導性人物薩繆爾森，雖然反對勞動價值論，仍然程度不等地承認勞資矛盾和貧困問題的嚴重性，並還將分配、福利和道德等問題納入或融進了經濟學的分析體系。

## 二、“中立論”的始作俑者： 西尼爾的虛偽和巴斯夏的畫蛇添足

一些經濟學家利用古典經濟學中勞動價值論和效用價值論的矛盾，否定前者，修善和利用了後者。新古典經濟學的先行者們也在其列。這也是那個時期勞資衝突尖銳化、社會主義思想迅速蔓延導致的富人社會和政府的一種迫切需求。

但是，僅僅否認勞動價值論是不夠的。“富人經濟學”還需要整體包裝，以普濟世間、超越各階級之上的高貴身份降臨，以徹底麻痹勞動者階級和社會精英中富於正義感的群體。英國人納騷·西

---

<sup>16</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261~262頁。

尼爾最大化的滿足了這種偽善的意識形態要求。

而同期的法國人費雷德里克·巴師夏也以《和諧經濟論》為其唱和，並在中立的“科學性”之外還加入了普世的“宗教的權威性”，以表示自身天使般的公正和超凡脫俗。

我們先來看主張“非價值取向”的“純科學”的西尼爾是如何普度眾生的，然後，再返照他的方法和理論的虛偽本性。

— 他主張“富人經濟學”，十分膚淺而可笑地認為資本家的富裕來自他們的“痛苦的個人節慾”，— 後來的馬歇爾等看到馬克思對“節慾論”的辛辣嘲諷，也感到這種說法過於幼稚、令人困惑，而予以糾正。<sup>17</sup>

— 當他看到資本家不能如他早期所相信的那樣自發地提昇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相反地，而是以殘酷剝削和政府鎮壓激發了工人階級持續的、大規模的反抗時，在 1830 年他就開始轉而肯定工人階級長期生活在極端“對貧困的恐懼”中絕對是有必要的，反對當時的濟貧法和政府對於窮人和失業者的救濟。他寫道，勞動階級“他們憑藉著暴力、罷工和聯會，不僅是在威脅著財富的基礎，更是在威脅著自己的生存”。<sup>18</sup> 這等於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不能有反抗；哪裡沒有反抗，哪裡就被壓迫者才能苟延殘喘地生存在“對貧困的恐懼”中。這真是一種蠻不講理的“空想資本主義”。

— 他不遺餘力地反對社會主義思想，十分痛恨社會主義者主張平等的觀點，認為消除不平等是錯誤的，“公平只會帶來極度的痛苦”，是“窮人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

<sup>17</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240~241、261 頁。馬克思的批評是：庸俗經濟學家從來沒有注意到這種簡單的思考：任何一種人類行為，都可以認為是它的反對物的“節慾”。吃是斷食的節慾，行走是站立的節慾，勞動是怠惰的節慾，怠惰是勞動的節慾，諸如此類。這些老爺頂好是仔細想一想斯賓諾莎如下的命題：確定即是否定。

<sup>18</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114 頁。

poor) ”。<sup>19</sup>

— 他的“改革建議”是使佔社會多數人口的勞動者的貧困狀況江河日下。E·K·亨特教授這樣描述了 1832~1834 年間西尼爾在公共政策改革上的貢獻：他憑藉著與最有權勢的大人物的交情，積極參與政策制定，作為“濟貧法調查委員會”的成員主筆完成了制定新濟貧法的報告，提出了“十分經濟的改革建議”。

新濟貧法體現了委員會報告的如下觀點：（1）不論工作環境和工資狀況如何，工人都接受市場提供的任何工作；（2）任何不去工作，或找不到工作的人，只給他不必忍受飢餓的救濟；（3）救濟不應高於市場中的最低工資，應使他的狀況變得十分痛苦，從而促使他有動力去尋找工作而不計較工作環境和工資。

一位當代的經濟學和社會學歷史學家在評價西尼爾影響甚大的濟貧法時，這樣寫道：

“與其說這是一個物質解決方案，還不如說它是一個壓迫的和退化的機制。這比 1834 年前的濟貧法有更多的非人待遇，並比最低外部工資制度更加不合理。作為對貧困的懲罰，它強制勞動者進入像監獄一樣的工廠，強行分開丈夫、妻子和孩子，甚至打消他們生育出更多貧民這一危險的誘惑。”<sup>20</sup>

就是這麼一個階級立場和意識形態取向鮮明、針對窮人的政策主張刀刀濺血的“富人經濟學”家，在經濟學史上“第一次”<sup>21</sup>明確交代說明了經濟學方法的“中立性”。他的這種立論與他的理論及政策主張形成了一道互為諷刺的風景線。可能，正是他的“方法”要求經濟學層面的分析要撇開福利和倫理因素，所以，他的政

---

<sup>19</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115 頁。

<sup>20</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113~115 頁。

<sup>21</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116 頁。

策主張才會對於社會最大多數人——勞動者或窮人，是如此的危險和不倫理。

同樣，正是由於他主張經濟學的“中立性”，所以，他可能以為自己的理論就具有了廣大的影響力，——實際上是欺騙性和少數書生自欺欺人的自慰，客觀社會效果並不理想。自西尼爾提出這種謬論以後，經濟史中的勞資衝突起起伏伏，並沒有在世間遁形。

這裡，聯想到馬爾薩斯反對救濟窮人、反對工人漲工資等歪理，聯想到今天中國一些經濟學人因其新自由主義的奇談怪論和蠻不講理而受到大眾在網上、網下的廣泛批評，可見某類經濟學理論觀點和經濟學人不會受到大眾的歡迎，是“古已有之”的“國際慣例”。當然，有人也不在意。因為，“不知道老百姓是誰”；無非都是“民粹主義”。但是，列寧的個人簡歷告訴我們，在其兄長的“民粹主義”之後，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化——列寧主義出現了。

言歸正題。1836年，西尼爾在《政治經濟學大綱》第一章中充分表達了他標榜中立的經濟分析方法。那個時期，由於社會矛盾和衝突日益發展，經濟家被捲入了反映社會衝突中各種利益集團地位的規範化或倫理學的闡述中，比較注重研究社會福利問題，結果經濟學理論存在許多的爭論。在這種爭論中，社會主義思想也在蔓延。面對這種爭論不止的現象，西尼爾開始反對在經濟學中應用倫理學和討論福利問題，提倡“純科學”。E·K·亨特教授將西尼爾的觀點概括如下：

倫理學的闡述並不屬於科學範疇內的證明或是反證明。因此，只要它們是經濟學理論的構成部分，科學進步就永遠也不可能使經濟學家們達成一致。如果政治經濟學要成為一門科學，那麼首要任務便是消除掉一切蘊涵其中的不科學、倫理學的命題。當這些命題被消滅掉以後，就只剩下幾條經濟生活的經驗主義原則。

而後，通過運用演繹推理的邏輯方法，經濟學家就能夠找出這些經驗主義原則蘊涵的理論和實踐觀點。這些結論的運用和實施並不是作為科學家和經濟學家所關心的問題，而是倫理學家和立法者所關注的。政治經濟學也將成為一門非價值取向的、中立的“純科學”。<sup>22</sup>

西尼爾寫道，這種“純科學”所討論的主題“不是福利，而是財富”。而有關的幾個命題“簡直不需要證明，甚至不需要詳細表述，差不多每個人一聽到就會覺得在他的思想上久已存在，……具有普遍意義”。<sup>23</sup> 當然，爭論也就消除了。

但是，不爭論的限制是徒勞的。因為，僅就理論本身而言，西尼爾就是爭論性地提出了幾個缺乏水平的非常“需要證明”的命題。他的“具有普遍意義”命題還在方法上自相矛盾，居然採用他反對在經濟學中使用的倫理學觀點來解釋資本家利潤的來源，並且進而否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階級差別。

E·K·亨特教授指出，這個人提出的經濟學方法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經濟學家認為自己的理論命題十分重要，那是他已經剔出了他相信不重要的內容。“但是，什麼才構成重要問題或重要事實，這完全是建立在理論家自己的價值判斷基礎之上的。”<sup>24</sup> 西尼爾的“基本命題”剔出了道德和倫理上讓人無法接受的結論，而他的後繼者進一步發揮，在經濟學中假定，道德和倫理價值已經被抽離出去了。這些行為本身不是價值判斷和取向嗎？

另外，我們知道，在 100 多年以後，在經濟學中“重建倫理層

---

<sup>22</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116 頁。

<sup>23</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116 頁。

<sup>24</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117 頁。

面”取得了突出進展的阿馬蒂亞·森，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sup>25</sup> 其在經濟學和世界銀行等機構政策研究中的影響也在不斷擴大。這是不是意味著不聽西尼爾的話並不“將是致命的”呢？其實在今天，面對世界的不和諧狀況，恢復經濟學層面的倫理分析，已經成為經濟學和經濟學家進步的標誌之一。

E·K·亨特教授認為，西尼爾提出的為數不多的四個經濟學的“基本命題”中也存在明顯的問題，他關於資本主義社會最為重要的理論結論甚至有悖於他提出的方法。

— 他在固守“效用決定價格”時，認為財富在個人之間的效用不能比較，這比邊沁（1748~1832）以財富的邊際效用遞減為基礎，提出應當將富人財富分給窮人以增加社會總福利的理論倒退了。他否認當時存在週期性經濟危機，這是違反常識的。<sup>26</sup>

— 他固守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認為勞動人口的貧困來源於他們的道德和智力低下。一種減少貧困“有效且永恆的方法”，是“提高勞動人口的道德和智力品質”。但是，為了控制人口，讓工人階級長期生活在極端“對貧困的恐懼中”絕對是必要的。沒有窮人的犧牲“去承受代價，那麼就不會有普遍的進步產生”。<sup>27</sup> 這種“犧牲窮人論”，是不是富人的價值取向和道德呢？

— 他的資本積累理論，明顯地採用了他所反對使用的道德標準來解釋經濟過程。他認為，利潤相對應的關係是“節慾”。利潤是資本家進行痛苦的節慾的補償。利潤因為這種痛苦而顯得合理。一個國家財富最重要的來源在於資本家的節慾。<sup>28</sup>

— 他的地租和收入分配理論否認了不同階級收入分配的差

---

<sup>25</sup> 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7 月。

<sup>26</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118~119 頁。

<sup>27</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120 頁。

<sup>28</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120~121 頁。

別。他認為，地租是工資和利潤的一個構成部分。所有收入的來源都是相同的。他寫道：

我們已經把地租定義為自然或是偶然提供的自發收入。工資是勞動的獎勵，利潤是節慾的獎勵。……幾乎不能對它們進行準確的歸類。歸類有些時候看上去並不是永恆的，反而通常是任意專斷的。階級之間的差別，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錯覺。在自然的情況下，工人和雇主之間的關係是自發且友好的，他們的利益是和諧的。<sup>29</sup>

他認為階級對立的理論是“窮人政治經濟學”，只會被“思維沒有受過訓練的或是感情氾濫的人接受”。而窮人一旦接受了他的階級和諧理論，就會開始支持“富人經濟學”。

為了在英國避免再次重現“1830年恐怖之秋”，“爆發駭人聽聞的大規模工人階級暴動”，為了反對“窮人政治經濟學”，西

---

<sup>29</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122~123頁。2007年5月17日，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海藩在全國工商聯組織的一次討論會上提出，對中國的私營企業（所謂“民營企業”）來說，“企業是企業家投入資本，勞動者投入勞動力的共同投資。民營企業的勞動關係應該是平等的、協商的、人性化的”（〈實現民營企業和諧勞動關係的新途徑〉，《中華工商時報》2007年5月29日）。他與西尼爾、巴斯夏、薩伊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如，薩伊宣佈，“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大意義在於認識到政治經濟學證明了富人和窮人……並不是彼此對立的。那些所有的競爭關係全都是愚蠢的說法”（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111~112頁）。不過，按照劉教授編造的私營企業是業主和雇員“共同投資”說法，可以把私營企業看成是企業所有成員集體投資的公有制企業，否認勞動和資本之間不平等的特殊交換關係，否認勞資矛盾，這是一個發明，有違黨內有關文件的說法，也不符合西方標準的企業產權理論，在國家工商局註冊登記也通不過。在這方面，外國資本家在中國投資的成千上萬的私營企業客觀上也在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他們是否也適用或認可這種說法呢？這種“應該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能夠說服多少中國工人、農民工和其他老百姓？能夠減少多年來直線上昇的勞動爭議和相關的群體性事件嗎？

尼爾就這樣完成了“富人經濟學”的“中立”性意識形態再造工程。

幾乎在同一個時期，在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思想在法國迅速蔓延的背景下，法國人費雷德里克·巴斯夏在《和諧經濟論》中也試圖證實私有財產、資本、利潤和現存財富分配制度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和西尼爾一樣，其理論主張首先是旗幟鮮明地反對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反對工人運動。同時，標榜自己的客觀性和中立，“主張科學的權威性，並以此為其理論辯護”。他寫道，“社會主義學派跟星象學和煉丹術一樣依靠想像，政治經濟學跟化學和天文學一樣依靠觀察……兩者之間的鴻溝是不可逾越的”。至此，他言猶未盡，進而用普世宗教的權威性為其理論辯護：“我們以信仰的名義宣佈……我們信教的人則有權高喊：讓上帝的秩序和正義自由放任！”而社會主義者則說，“因為我們不想自由放任，因為我們提出的每項社會計劃都比上帝的更好”。<sup>30</sup> 這樣，他的理論同時擁有了科學和上帝的雙重權威，並在這個意義上超越了西尼爾。

但是，他的價值和意識形態取向，以及爭論的習性並沒有因為“科學”和“上帝”的降臨而消弭。他對於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激烈批評就是一例。

另外，他的經濟理論的科學性也受到嚴重的質疑和批評。例如：

— 他把經濟學歸結為交換。他認為在交換中“產業所有者們……同工人的權利沒有兩樣”，僅是以“自己或先輩的實際服務換取等量服務”。資本來源於資本家出於道德習慣的“節慾”。這與西尼爾自相矛盾的“節慾論”如出一轍。<sup>31</sup>

— 他把自私看成實現社會和諧的機制。“如果人們的行為都

---

<sup>30</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146~147頁。

<sup>31</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152頁。



以個人利益為動機，那麼整個社會將達到和諧狀態”。<sup>32</sup> 但在當時，資本家和政府的自私，是用刀槍大規模鎮壓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的工人。而在理論上，即使把一個抽象的人性僅僅歸結為自私，而忽視其利他的天性，也是片面的，——這受到了後來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家的嘲笑。阿馬蒂亞·森也曾總結性地評論過這種片面的觀點：“那種非常‘私人’的個人觀，——不關心世界的其餘部分——在經驗上是不現實的，在理論上是誤入歧途的。……在針對不同國家的比較經濟學文獻中，‘非私人的’價值觀最近已經得到普遍的重視”。<sup>33</sup> 自私並不能實現社會和諧。“事實上，囚徒困境往往被視作描述‘自私’如何損害所有人的經典事例。”<sup>34</sup>

——他斷言在資本的增長中，勞動從中提取的絕對額和相對額都會增加，——這就“證明勞動者及其雇主之間顯然就存在著利益的和諧”。但這之前、之後的經濟史和左、右翼的許多經濟學家都表明，在資本的增長中，資本家手中的資本越來越多，勞動者的相對提取額在降低，這能夠證明資本主義在創造“和諧”的勞資關係嗎？<sup>35</sup>

巴斯夏“科學”的“政治經濟學跟化學和天文學一樣依靠觀察”，得出就是這種低劣水平的理論。他是否還“觀察”到“上帝”了呢？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先行者中，並不是所有的學者都與西尼爾和巴斯夏完全一樣。為新古典經濟學奠定了傳統哲學基礎的邊沁（1748~1832），他的早期作品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但在事實的教育下，他的後期理論開始主張對資本主義實行“改革主義”，要

---

<sup>32</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149頁。

<sup>33</sup> 阿馬蒂亞·森：《理性與自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9月，第199~201頁。

<sup>34</sup> 阿馬蒂亞·森：《理性與自由》第197頁。

<sup>35</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155頁。

求政府適當干預經濟，原因一是儲蓄可能與新的投資不一樣，有時需要政府來增加經濟運行中的貨幣量，以保障財富增長；二是貨幣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因此，其他因素不變，政府採取行動將富人的錢通過再次分配轉移到窮人身上將增加社會的總效用。<sup>36</sup>

另外一個是薩伊（1767~1832），他用效用創造價值替換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對於新古典經濟學影響深遠，人稱其“清除了斯密中的一些危險思想”。他宣稱，節儉是資本的來源，勞動和資本包含著相似的犧牲，兩者在收入上擁有相似的道德公平性。

薩伊認為，“所有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同時，又說“所有者無論是通過事先佔有，暴力掠奪還是欺騙佔有等手段獲得實際擁有者的所有權，這對於產品的生產和收益的分配而言，並無意義上的不同”。<sup>37</sup> 這種在所有權上自相矛盾的主張，很讓國人耳熟：要大赦“原罪”！只要有生產和收益，國企被“欺騙佔有”為私產是好事，不然就像冰棍一樣化了！

薩伊與西尼爾不同，不是在經濟學中排除道德，而是用道德來論證勞資關係的公平性。但在取得財富的手段上，他竟然又為不講道德的行為和財富“所有者”辯護，衝破道德的底線。

薩伊宣佈，“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大意義在於認識到政治經濟學證明了富人和窮人……並不是彼此對立的。那些所有的競爭關係全都是愚蠢的說法”。<sup>38</sup> 這是他關於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價值取向、意識形態取向的非常坦白的觀點。

這兩個人的共同點是，一般並不迴避道德、福利和收入分配問題，在維護資本主義和資本家利益上非常直率。其中，邊沁在政策層面主張階級調和。邊沁的政府干預理論還直接為 100 多年後的歐

---

<sup>36</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108~109 頁。

<sup>37</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112 頁。

<sup>38</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111~112 頁。

美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混合經濟和福利制度的大規模“和諧”建設提供了理論準備。當然，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和《資本論》中，對這兩位的“庸俗經濟學理論”進行過深刻的批評。

綜上所述，無論是古典經濟學（和前古典經濟學），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著名的先行者們，在西尼爾和巴斯夏之外，佔多數的經濟學家都是以直接的經濟分析和專業語言來維護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社會，儘管其專業理論也往往透出主觀成見或蠻不講理的冷酷態度。

而西尼爾和巴斯夏則為資本的經濟學實行了全方位的整體包裝，在方法上就開始偽造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超凡脫俗。而正是在這種虛假的普世情懷中，為了永遠平息勞動者的反抗，在其理論籠罩下參與公共政策制定時，西尼爾完全是和實行鐵血鎮壓的政府穿連襠褲，在政策層面主張“把窮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依靠軍事力量”防範窮人，“制止”勞動者提高工資的要求和反抗，讓勞動者長期生活在極端“對貧困的恐懼”中是必要的。<sup>39</sup> 不愧是“魔鬼藏在細節中”。

由此也看到，剔出各種非資本主義西方經濟學不談，當時的西方經濟學（包括各流派）確實是一門具有“三講一不講”和好爭論特點的學科：在資本家的立場上，旗幟鮮明地講價值取向、講道德取向，講意識形態取向；在涉及勞動者利益時，往往是蠻不講理（階級調和理論還人道一些）；而與各社會主義流派展開不間斷的爭論更是其國際慣例。另外，面對勞資衝突，有的經濟學家乾脆赤膊上陣，參與制訂嚴刑峻法，成為暴力論的實踐者。

經濟史表明，只要存在勞資矛盾，這種西方經濟學理論就不好使，靠它吃飯的人就要有接受全民共討之的思想準備，域內不會是

---

<sup>39</sup> E·K·亨特著：《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114~115頁。

其獨霸的家天下。因為，它與社會大多數的勞動者處於對立面。在先前的時代，勞資矛盾激化了，它就要遭遇遊行示威、罷工罷課，乃至肢體衝突、流血衝突或改朝換代；在互聯網時代，讓它的宣傳者首先遭遇網絡批評，已經是在享受 IT 技術提供的人與人不照面的安全保護了。相應地，進一步從邏輯對應的關係看，為什麼各種非資本主義的西方（或東方）經濟學，就要不“三講”和不爭論呢？！經濟思想史表明，按下葫蘆起來瓢，只要存在階級對立和其他社會矛盾，“經濟學帝國主義”就擋不住不同經濟思想之間的爭論，全球同然。

在西尼爾和巴斯夏 100 多年後的 1983 年，著名的保守主義發展經濟學家 W·阿瑟·羅斯托坦承，他對共產主義的思想攻擊曾經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財力上的支持。他認為，“若要阻止和牽制不斷膨脹的共產主義力量的推進，這樣的鬥爭將是長期的，並且需要新的觀念來鞏固美國的外交政策”。<sup>40</sup> 羅斯托是在美國政府支持下進行“爭論”的個案，可能不足為訓。但是，E·K·亨特教授描述的在國際經濟學界發生過的一種普遍現象卻令人警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 20 年裡，新古典主義的兩個分支（指內部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流派 — 引者註）在鼓吹某種政策方面表現出了同樣的熱情。這種政策致力於摧毀任何地方存在的共產主義，阻止第三世界的經濟體進行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試驗。因此，即使是擁護自由放任政策的最保守的人，都支持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和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sup>41</sup>

此後，一些經濟學家參與政治和經濟動亂的現象並沒有消停。在 1980 和 1990 年代原蘇東國家的劇變中，在拉美、非洲和中東國

---

<sup>40</sup> E·K·亨特著：《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383~384 頁。

<sup>41</sup> E·K·亨特著：《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384 頁。

家的“結構改革”中，在亞洲金融危機問題上，在當今 21 世紀不曾停息的圍繞著美國決心進一步改革、分裂和肢解的那些國家的各式各樣的顏色革命中，又活躍著多少學以致用的經濟學家或經濟專家（有人稱他們是“經濟殺手”）？他們是“三講”還是不“三講”？（或者，他們中的一些人僅僅是自欺欺人的盲從者，是唯美元之馬首是瞻者？）<sup>42</sup>

### 三、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自由”的偽善和失敗

經濟思想史上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在資本勢力受到威脅或要謀取重大利益的關口，往往就會出現一些經濟學家，他們一方面公然為資本勢力梳妝打扮、出謀劃策；另一方面，他們又會假裝道貌岸然，為其狹隘的利益目標製造具有欺騙性的普遍的口實，在國內外實行“軟戰爭”，——在這樣做時，假冒不偏不倚的公允，瞞天過海，是最好的戰術選擇之一。

如果說在這方面 19 世紀的西尼爾是經濟學家中的始作俑者，而後來有些經濟學家一般地繼承了這種傳統，那麼，20 世紀中葉以來，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即新自由主義）則是其最突出的繼承人。

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信奉的極端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頗有恢復原始資本主義的味道，在西方長期處於邊緣狀態。1960 和 1970 年代之間，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日益深受“滯脹”的困擾，處於社會、經濟、政治和思想的慢性危機之中。凱恩斯主義的有效性受到懷疑和批評。這促進了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力快速增長。他們宣

---

<sup>42</sup> 對瞭解近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學界中的奇談怪論和謀私行為的人們來說，在這一部分展現的從西尼爾到薩伊，再到羅斯托們的言行中，都可以看到有某種歷史現象在重複。世界上少有新鮮事。

揚自己的貨幣政策和其他經濟 / 社會政策能夠解決凱恩斯主義不能解決的問題，得到了大財團和政府的鉅額資助。<sup>43</sup> 但是，他們的極端化理論和政策主張也頗惹爭議，導致了馬克思批判主義傳統的復甦。政治家如果多方面採用他們的主張，在選民和國會中難得高票。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加上要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新帝國主義政策的需要，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選擇了和西尼爾這種極端人物一樣的策略，假冒公允，自吹自擂。

E·K·亨特教授引用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重要人物在 1960 和 1970 年代爭取崛起時期的言論，寫道：

這兩個學派最耳熟能詳的言論之一，是聲稱他們的理論是純粹的、價值中立的、不包含任何規範性判斷的科學。這和西尼爾以及巴斯夏所宣揚的如出一轍。例如，弗里德曼就曾表示，“從原則上講，經濟學中是沒有價值判斷的”。同樣，理查德·麥肯齊和戈登·塔洛克……也曾寫道：“經濟學家所採用的方法應該是非道德性的，經濟學所考慮的不是應該是什麼……而是瞭解人們為什麼這麼做。”他們還辯解說他們的“分析完全（盡可能）摒棄我們個人的價值判斷”。……在從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觀點所撰寫的一本被廣泛使用的教科書中也提到“經濟學理論是‘明確的’或者說是‘非規範性的’”。

……他們宣稱其理論是“經濟理論的核心，適用於所有的經濟制度和國家”。<sup>44</sup>

但是，他們關於市場自發發展具有穩定性；壟斷不重要，與資本家無關；基本否定政府干預；以及對於外部性的分析等一直受到不間斷的批評，並且得不到經濟史方面的大量事實的支持，在新

---

<sup>43</sup> 馬也：〈新自由主義緣起考〉、〈新自由主義考之二〉和〈新自由主義考之三〉，《香港傳真》No. 2005~33、No. 2005~43、No. 2005~67。

<sup>44</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 391 頁。

古典經濟學中也沒有取得穩定的主導地位。

另外，弗里德曼（1912~2006）的貨幣主義也一直受到來自新古典主義內、外部的尖銳批評。例如，2001年薩繆爾森等在《經濟學》（第17版）中對貨幣主義的總結性批評是，“它並沒有創造出奇蹟”，“不是免費午餐”，並描述了“貨幣主義的衰落”。<sup>45</sup> 在2003年出版的《一種批判的經濟學史》一書中，英國人約翰·米爾斯系統地展現了對弗里德曼貨幣主義理論和政策主張的批評。<sup>46</sup>

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中，弗里德曼的政策建議是：廢除（1）公司稅。（2）累進所得稅。（3）免費的公共教育。（4）社會保障。（5）政府對於食物藥品的安全管制。（6）醫生的資格認證。（7）郵政行業的寡頭壟斷。（8）政府對自然災害的救助。（9）最低工資法。（10）高利貸發放者收取利息的上限。（11）禁止販賣海洛因的法律，以及除了實施產權法、契約法和提供國防之外的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預。在這些建議中，體現著自詡的“無價值取向結論”的價值取向是：“看不見的手”可以完成99.99%以上的事，並且最大地保證自由。其政策目標是，萎縮政府，放縱資本，自由貿易，降低工資，消除福利。這些政策建議和背後的極端自由市場理論，就是在新古典經濟學體系內部，也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只是自成一派。如代表保守主義的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中就一直主張混合經濟和福利制度，並批評原教旨主義的市場調節理論。

這些建議的落實情況和後果如何呢？以英、美為例來看：

1980和1990年代，在英國保守黨的執政期間，他們部分實行了奧地利／芝加哥學派的理論和政策建議，最直觀的結果是，英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血汗工廠遍地開花，國家競爭力沒有改進，保守黨下臺。至今為止，取而代之的工黨在這方面的治理也是困難

---

<sup>45</sup> 薩繆爾森等：《經濟學》（第17版）第576頁。

<sup>46</sup> 約翰·米爾斯：《一種批判的經濟學史》。

重重，缺乏實質性效果，兩極分化繼續擴大。

在美國共和黨的決策圈裡，多年來弗里德曼教授一直是“政治掛帥”的活躍分子。里根和布什父子視其為重要策士，相繼實行了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的部分自由主義政策建議。2002 年小布什尊弗里德曼為“自由英雄”。<sup>47</sup> 但是，美國實施部分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和英國一樣，兩極分化加劇（基尼係數達 0.469），“中產階級變新貧階級”，雇員階層的實際收入和福利下降，國內民怨沸騰，這些成為了 2006 年 11 月共和黨、小布什痛失國會山的主因，—— 哪像國內媒體的報導，僅僅突出了一個“伊戰不利”的問題。<sup>48</sup>

英、美這種政治現象的政策含義在於，在實行普選制的國家，極右翼“非道德性”經濟政策的部分或全面實施，會遭遇利益受損和日益覺悟的多數民衆的反對票，—— 這是為大資本服務的極右翼難以逾越的一道政治高牆。當然，在那些沒有實行普選制和嚴格控制遊行、罷工的國家，衆多線民的自發評論和配以相關的民情調查，也能夠提供具有選票價值的政治參考。

一個以貿易自由主義者為例的諺語挖苦說，“自由主義者贏得辯論，而保守主義者贏得選舉”。<sup>49</sup> 其實，僅就辯論而言，在新古典主義內部自由主義者還沒有贏得像樣的主導地位，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另外，英、美兩國的保守黨派都不全面贊成或膽敢全面實行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的政策主張。這種頗為明顯的保留態度也表明，這兩個自高自大的學派並非自詡那樣“適用於所有的經濟制度和

---

<sup>47</sup> 〈西方三位左翼學者評密爾頓·弗里德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文獻與研究》2007 年 40 期。並見《國外理論動態》2007 年 3 期。

<sup>48</sup> 夏小林：〈最大的社會不和諧：勞資關係 —— 兼評私權、市場和公共服務的局限〉，《香港傳真》No. 2007~2。

<sup>49</sup> 安塞爾·M·夏普等：《社會問題經濟學》（第 15 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2 月，第 226 頁。



國家”。

而制度學派的諾斯教授根本就不承認這種虛假的妄自尊大。因提出“歷史的終結”而名噪一時的福山，近年也開始承認各國發展的多樣性，說自己已經轉變為“列寧主義者”了。

這裡再補充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一點兒案例，事情就更熱鬧了。1970年代，弗里德曼及學生曾經在智利給靠軍事政變上臺，殺人如麻，兩手沾滿左翼人士和大眾鮮血的軍政府充當智囊，出謀劃策，但其“休克療法”並不成功。智利的宏觀經濟和增長沒有實現穩定目標，收入分配問題則加劇惡化。在1990年皮諾切特執政的最後一年，20%的最上層人口控制了55%的財富，最下層的20%人口控制4.4%。比1970年，前者的財富增加了十個百分點，後者減少了3.2個百分點。<sup>50</sup> 在1970年代，弗里德曼還帶著弟子轉道巴西為軍政府服務，但那裡的將軍們似乎比後來滅了前蘇聯的葉利欽聰明，很快看出弗里德曼一派的無能，拒絕“休克”，並回到了國家指導下的工業化模式。而在1990年代，俄羅斯才在付出空前慘重的代價後以普京上臺為標誌，給“休克療法”劃上了一個可能是具有普世意義的休止符。這種現象進一步向世人昭示了一條道理：自詡“沒有價值判斷”、“非道德性”的極右翼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絕對不是“中立”的，並且缺乏經世濟民的真功夫。他們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再搗亂不止，總給人家帶去各種災難的精神確實是“非道德性”的。同時，他們使大資本更富有，又是完全符合大資本的道德信條的。

在實行普選制的國家，這類理論是為右翼政黨或右翼執政黨提供思想依據和各種忽悠人的說法，而宣揚它的經濟學家往往成為這些政黨或政府的重要策士。在大資本或右翼執政黨的支持、贊助下，

---

<sup>50</sup> 〈西方三位左翼學者評密爾頓·弗里德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文獻與研究》2007年40期。並見《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3期。

這類理論和經濟學家在媒體上享盡風光，聲譽鵲起，儼然是一番“帝國經濟學”派頭，但是仍然免不了有一天黯然銷魂，“落花流水春去也”；在民主制度不完備的發展中或轉軌國家裡，在與社會主義運動對壘時，這類理論和經濟學家往往會天然地或與實施暴力政變的右翼政府聯合作戰，或與右翼的暴力鎮壓聯姻。經濟學和經濟學家中有政治，藏刀槍，“該出手時就出手”。這已經是從西尼爾至弗里德曼之間延續了近 200 年的一種鮮明的歷史傳統。而即使再往前追溯，以及往其他非極右經濟學流派看去，也未必就沒有相應的根據可尋。如重商主義的理論和自由貿易政策與“炮艦政策”聯姻，重農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與法國大革命遙相呼應，古典經濟學認可國家機器維護富人利益，等等。簡言之，“自由”和“看不見的手”需要看得到的握有暴力的政府之手保護，並在全球“自由”地跨境越界，採用和平與暴力、陽謀與陰謀的方法推銷自己，以實現原始帝國主義和現代“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的利益。這種現象的存在，是不以那些還存有善意、人道主義精神和客觀態度的經濟學家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

實踐出真知。反面經驗更育人。近十多年來，以“華盛頓共識”為標籤的新自由主義在全球連連受挫，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陷入了不受歡迎的境地，經濟學界批評的聲音也越來越多，建設性的理論和方法創新逐漸顯山露水，<sup>51</sup> 更是一方面暴露了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具有普適性的虛偽，另一方面大大削弱了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的公信力和影響力。經濟學在 21 世紀已經面臨又一次綜合性革新。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相繼

---

<sup>51</sup> 傑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展經濟學前沿——未來展望》，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這本文集彙集了一批著名經濟學家和其他學科的專家對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的批評，並反映了他們的建設性思想。另外，陳平在《經濟研究》2006 年 10 期發表的〈從華盛頓共識的失敗看經濟學變革的方向〉中，也較廣泛地介紹了有關學術情況。

故去，更會有利於這一進程的展開。

2006年，香港特區政府準備進一步完善公共政策，適當干預經濟，解決一些發展問題。年邁的弗里德曼立即發文，以自由主義的名義對此提出質疑和批評。內地有個反對房地產市場“自發調節”人，也搖身一變，鸚鵡學舌。香港幾家媒體的記者立刻發文反駁道：香港經濟是大資本統治，政府不干預，則無益於民生，弗里德曼的言論不合港情。不久，弗氏辭世。是時，不僅小布什和撒切爾等右翼政治家盛讚其人，內地一學人也撰文，“歷史向他低頭”。果真如此？全球不低頭的多數人，包括那幾個香港小記者，他們有“道德和價值取向”，並且不會“有利於”大資本，但他們屬於歷史嗎？

#### 四、右翼、左翼的共識：

#### 為什麼人服務是經濟學的大本大源

其實，關於經濟學是否“中性”的爭論由來已久。

馬克思明確地否認了這個偽問題。他認為，不同流派的經濟學都在反映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例如，批判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後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sup>52</sup>

馬歇爾為資本主義辯護，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超過它的缺點”，並對社會主義主張進行了較為溫和的批判。但由於資本主義存在缺點，他和穆勒（1806~1873）一樣表示，經濟學和經濟學家要講倫理，要關心財富分配，要抵制富人的不義之舉，要同情窮人。簡言之，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價值取向不能一邊倒，

---

<sup>52</sup>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14頁。

要向窮人方面偏一偏。他寫道：

事實上，近代經濟學的創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溫和、富有同情心和爲人道的熱忱所感動的人。他們很少關心爲自己謀取財富；他們卻很關心財富在大多數人之中的廣泛的分佈情況。反社會的壟斷雖然是強有力的，但他們也是反對的。在幾代之中，他們都支持反對階級立法的運動，這種立法不許工會享有雇主團體所享有的那些特權……，等等。<sup>53</sup>

這種保守主義的調和態度，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人道主義精神的經濟學家的折衷主義價值取向，但並不否認經濟學和個人維護現存制度的基本的價值取向。馬克思對這種調和主義的評價是“企圖調和不可調和的東西”。<sup>54</sup> 但是，精神可嘉。因為，今天有的經濟學人甚至缺乏穆勒和馬歇爾的道德水準和那種較為求實的學術精神。

劍橋學派的瓊·羅賓遜（1903~1983）發表的意見是：

社會科學中存在大量令人迷惑的有關“價值判斷”的爭論。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意識形態、道德觀念和政治立場。試圖假裝自己沒有任何價值判斷，並且是十分客觀的行爲，注定只能自欺欺人或者僅僅是矇騙他人的伎倆。一個坦白的作者會清楚表明他的先入之見，並且允許那些無法接受這些觀點的讀者對之不予理睬。這種態度關係到一個科學家的職業操守。<sup>55</sup>

在這之後，我們看到國、內外的一批經濟學人確實對馬克思、馬歇爾、羅賓遜的肺腑之言“不予理睬”，對西尼爾和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情有獨鍾。看來，有關爭論是會一直繼續下去了。

---

<sup>53</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249頁。

<sup>54</sup>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214頁。

<sup>55</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第391頁。

至此，以史為鏡，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已經清楚地顯現出來了：對於經濟學和經濟學家來說，為什麼人服務的價值、道德和意識形態取向是大本大源問題。這個道理，古今中外，右翼、左翼，概莫能外。

這個事實和判斷不是左翼的發明。起碼，首先在 16 世紀的重商主義，繼而在重農主義和古典主義的“富人經濟學”中就表達出來了。然後，在左翼經濟學興起之後，才在客觀上形成為右翼、左翼的共識和雙方都自覺遵守的遊戲規則。不過，右翼中有一些自作聰明的極右翼經濟學家口頭上不承認，並力圖掩飾它。而另外有一些人則是被那些“中性”的言論給忽悠了。

E·K·亨特教授在《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一書中，另闢蹊徑，大量引用西方經濟學家，特別是引用 100 多年來著名極右翼學者的言論和自相矛盾的窘況來證明了這一點，引人入勝，發人深省，有助於澄清經濟學和經濟學家服務目標上的混亂問題。

在中國，重複西尼爾和巴斯夏，以及奧地利 / 芝加哥學派關於經濟學非價值、非道德、非意識形態取向的聲音也不時凸顯出來，並形成了一種語境。在這種語境的庇護下，不時也能夠看到某些人在照搬國外極右翼的理論觀點，打著“改革、開放”旗號提出錯誤的政策主張，例如主張政府當“守夜人”、公共服務最小化、全面實行“代議制 + 市場化”、“市場越自由越好”、反對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放任資本和企業家、國有企業全部或基本私有化、無條件對外開放國內市場、政府放棄干預勞動市場、取消最低工資制度，以及抹煞私有制和市場制度下會發生的勞資矛盾和社會兩極分化問題，漠視道德倫理、公有財產合法性、勞動者合法利益、社會 / 政治民主問題和官員 / 社會腐敗問題，將社會主義的歷史妖魔化等等，基本上也是在重複國際上新自由主義為中國設定那一套路線

圖，並無創意。目前，經過幾年或暗或明的爭論，加之中央一再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這些聲音的市場有所縮小。我們要問的是：這些中西合璧的聲音中是否也存在一些“有政治，藏刀槍”的問題？

人類文明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演進的機制更為複雜。各種文明在衝撞、激蕩中交織在一起，進而發生新的綜合，演繹出更新層面的文明，這已經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般規律。

古典經濟學維護資本家的利益，但各種社會主義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從其勞動價值論中獲益匪淺。而西方國家在 1930 年代大危機和“二戰”後逐步廣泛實行的混合經濟和福利制度，和社會主義運動（包括高速增長的“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大鍋飯”）的強大影響也密不可分。

西方經濟學顯在或潛在的“三講”，並沒有妨礙有關專業人士對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的描述、分析和對相關公共政策的仔細研究和認真制定。而相應的政策成果和學術成果，我們也可以結合具體的國情，酌情參考，甚至採用“拿來主義”的態度。

例如，中國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離不開官員們去參考發達市場國家的理論和考察其運行模式。其中有的具體方法，也可以拿來為我所用。但是，不能迷信，認為就此便能消除兩極分化，要看到他們的局限，看到他們今天仍然穿著紅舞鞋，在兩極分化的舞臺上加速旋轉，始終下不了臺。<sup>56</sup>

西方經濟學中上百年來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批判聲音，其中也有可聽、可參考、可吸收之處。例如，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表明，西方經濟學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缺陷的批評，對國有企業中存在效率缺失和內部人控制現象的批評，對政府機構和官員具有自利

---

<sup>56</sup> 夏小林：〈最大的社會不和諧：勞資關係——兼評私權、市場和公共服務的局限〉，《香港傳真》No. 2007~2。

性和可能被利益集團“俘獲”的批評，對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的批評，對經濟增長缺乏可持續性和公平性的批評，對當前公共服務不足、某些規制不當、貧富差距拉大、血汗工廠和腐敗現象的批評等等，其中一些內容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但是，有一類特殊情況也是需要我們時刻保持警醒的。例如，“華盛頓共識”之一是要“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批評這句話是白費勁。但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拒絕國際金融機構的錯誤建議，另搞一套，真正實現宏觀經濟穩定和香港穩定，靠的還是中國自家人爐火純青的真功夫。

再如，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沒有問題。一些國際機構說非公企業的政策環境要進一步改善，那也是政府和方方面面正在努力解決的事兒。在這種背景下，對那種刻意將非公經濟發展環境妖魔化的批評（如說個體私營部門得不到貸款等），以及要廢除“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憲法條款的建議，則要多問一個“為什麼”。

總結以上，一個淺顯的啟迪是：不同制度的國家之間，“三講”立場不同的經濟學和經濟學家之間，相互交流學習、取長補短是必要的，其中的交流機制也很有必要展開深入的專門研究。但是，一定要警惕冒充公允的騙子。另外，廣採博納時“不逾矩”是重要的，是大智慧。

西方經濟學內部充滿了爭論。撇開其中的左翼不論，整個新古典經濟學從總體結構到許多局部的觀點和政策建議，都面臨著不停的爭論，具有不確定性。何況，其內部還有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爭。西方經濟學中也不乏偏見和“死胡同”，不乏“政治掛帥”的潛在機制，不乏與獨裁政府和暴力聯姻，乃至實行跨國干預的傳統。西方經濟學正是在這種矛盾和遠非超脫出世的狀況中在往前走。走到今天了，一位研究經濟史和經濟學史的英國經濟學家還是

不客氣地說，就解決宏觀經濟穩定、就業、收入分配、經濟增長等重大的實際問題而言，經濟學還是“沒有有關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且從未作出過回答”。<sup>57</sup> 薩繆爾森的一位老校友的表達則委婉得多：這是問題依舊，答案在不斷改變。<sup>58</sup> 這個現象的哲學含義是，別人都沒有整明白的答案，至多可以用來做衝撞、激蕩和啟發思想的原始素材，但沒有理由奉為金科玉律。

最後，用凱恩斯的話來結束這篇札記：“研究思想的歷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sup>59</sup>

---

<sup>57</sup> 約翰·米爾斯：《一種批判的經濟學史》第5頁。

<sup>58</sup> 薩繆爾森等：《經濟學》（第17版）第606頁。

<sup>59</sup> 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扉頁。